

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理論芻議¹

鄭邦彥²

The Praxis-Oriented Museum Studies: Some Theoretical Notes

Pang-Yen Cheng

關鍵詞：研究典範、博物館研究、行動研究、研究即實踐、批判博物館學

Keywords: Research Paradigm, Museum Studies, Action Research, Research as Praxis, Critical Museology

¹ 筆者特別感謝兩位審查人，對拙文裡出現的諸多概念，特別是在「實踐」作為知識論與方法論的釐清上，不厭其煩且鉅細靡遺的提點指正與鼓勵。有關本文撰寫初衷、對審查建議的回應及其他，敬請參閱文末後記。

²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助理研究員、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Assistant registrar, Department of Registration and Convers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pangyenc@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10 月 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

摘要

實踐取向研究主張：在行動者認知背後尚有社會結構概念存在，即人的行為與認知往往受到意識形態或其他社會組織等結構因素影響不自知，以批判和賦權為基調，不僅要喚起研究參與者的批判意識，使其瞭解身陷受壓迫情境，進而創造公平與正義的社會，而研究者於研究歷程乃主動提供改變現況策略，同時協助研究參與者具備自我組織和轉換能力。因此，實踐取向研究不只有客觀描述現象、主觀詮釋兩種途徑，尚有介入與協助改變的意圖。本文以梳理 Teather (1991) 在〈博物館研究：反映中的反身性實作〉(Museum studies: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 一文為主軸，漸次交待「實踐取向研究典範」、「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與「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等三層次之理論芻議。其中，Lather (1986)「研究即實踐」(Research as Praxis) 與 Schön (1983)「反映的實踐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等原創性論述和倡議，實為「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的先聲，再經 Teather (1991) 納入當代博物館學思潮，已相當程度改變了當代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宣示了博物館研究的理想倡議。文末，冀以引介「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為臺灣博物館提出介入與變革的在地實踐與可能路徑。

Abstract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maintains that there are social structures existing behind an actor, i.e., human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re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ideology and other social structures. Thus, by means of criticism and empowerment,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provokes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 research participant, allowing one to become aware of the oppressive situation, and further take action to build an equal and just society. Along the process, the researcher initiates strategies to effect change, and helps a research participant to transform and empower oneself. Therefore,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does not merely provide descri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but also

intends to intervene and produce change. Based on Teather's (1991) "Museum studies: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ree levels of theoretical notes, namely, "a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 "a praxis-oriented action research," and "praxis-oriented museum studies." Lather's (1986) discourse "Research as Praxis" and Schön's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actually provided insights toward "praxis-oriented museum studies." Teather (1991) followed up with some key ideas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main trends of contemporary museology. These discourses brought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enhancement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museums and society, and offered ideal concepts on museum studies. With these, "praxis-oriented museum studies" allows practical paths and local praxis to introduce intervention finally, and produce change in Taiwan's museums.

楔子：實踐取向研究典範

1962年，Thomas Kuhn (1922-1996)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首次提及“paradigm”，本期專題徵稿中譯為「典範」(另一中譯為「派典」)，泛指科學社群成員所共享的價值體系，包括對世界的看法、獲得知識過程與研究實施程序等(Kuhn, 1962)。Morgan (1983a)指出：不同的知識論反映本體論上的認知差異，主要有1.知識是客觀世界的反映；2.知識是個體主動建構的過程；3.知識是主、客觀世界的聯合產品等三種不同假設，由此建構「知識是靜態的」、「知識是動態的」和「知識是辯證的」等不同知識觀，呈現「『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多重管道，並將方法論層面的研究典範區分：實證的研究典範(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現象學的研究典範(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和批判／實踐的研究典範(critical/praxis research paradigm)等三類，其中，「批判／實踐的研究典範」係以詮釋的「現象學」為基礎而發展。Lather (1986)以〈研究即實踐〉(Research as Praxis)為題，撰文闡述「實踐取向的研究典範」(praxis-oriented research paradigm)基本主張；夏林清(1996)以「研究即實踐」、「研究過程即批判探究」、「研究者即『熱情學術』的批判者」等角度，將Lather倡議的實踐取向研究典範向臺灣學術界介紹。以下謹依Lather(1986)原典主張，併參考夏林清(1996)引介及徐偉民(2004)摘錄整理，說明「實踐取向研究典範」之基本主張。

一、研究即實踐(research as praxis)

Lather (1986: 158)將實踐取向研究典範視為是一種追求可以增加研究對象知覺，使其能夠瞭解並看清日常生活中所隱藏的矛盾、扭曲事實之實踐，將「實踐」定位於在理論與實作間來回修正的辯證張力(the dialectical tension)，自認受到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research)、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俗民誌(neo-Marxist critical ethnography)與弗雷勒「賦權式」或參與式研究(Freirean “empowering” or participatory research)等的影響，進而建構「研究即實踐」的新典範。是故，「實踐」是於行動中不斷「自我反映的探究」

(self-reflective inquiry)，為謀求更好的生存環境、對生活世界產生的反省與行動；「實踐取向研究典範」認為人們生活在非公平、正義的社會，人們思考與行動往往受到各種結構或意識形態支配而不自知，進而主張研究應該承諾創造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因此，該典範研究目的不在於追求「價值中立的知識」，而是追求「解放的知識」。實踐取向研究典範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實踐」視為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社會活動，等同於社會實踐，具有動能性、客觀性和社會歷史性等特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實踐，包括生產鬥爭、階級鬥爭與科學實踐等三種基本形式，其中，生產鬥爭是最基本實踐活動（夏林清，1996：100）。

Lather (1986: 257)基於對實踐張力的體察，進一步指出研究歷程應是一種「探究的民主化過程」(a democratized process of inquiry)，包含協商(negotiation)、互惠(reciprocity)與賦權(empowerment)等三種特徵，並以下兩點為基本假設。其一，人類科學已由實證主義轉向後實證主義發展，呈現不同研究典範的多元與差異。在後實證主義時期中，研究者企圖尋找「解放的社會科學」(an emancipatory social science)，解放的社會科學不僅提示生活世界中權力和資源分配的不均等現象，並致力於現象的改變、創造更公義的世界；其二，既然存在權力與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為建立更平等與公義的社會，研究者及其採取研究行動不僅該無所迴避，且理所當然有所批判，抱持投入承諾的姿態（夏林清，1993：101）。一如 Morgan (1983a)指出：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再只是抱持客觀超然立場，追求對研究現象瞭解外，更抱持承諾與涉入的態度與姿態，希望透過自身介入，主動提供改變現況的策略，以喚醒被研究者的批判意識、擺脫受支配現況並協助被研究者具備自我組織與轉化能力。就研究而言，研究行動本身即實踐，因研究者在行動中反映對特定現象的瞭解和分析（即理論），以及所採取的研究策略與行動（即實作），兩者間所存在的關係並非研究者一廂情願的想法，而是兩者間互動、形塑彼此及不斷修正的歷程，即 Lather 所指稱的辯證張力，構成實踐之所以成為實踐的道理。套用 Koba 的話「實踐即為理論與實作的融合體」（引自徐偉民，2004：35），一旦理論與實作間不存在

任何張力成為例行性操作，已不再是實踐。

二、研究過程即批判探究

Lather (1986)站在「知識從來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在特定歷史和情境脈絡下，根據時人與所處情境下所建構而成」的知識論上，提出實踐取向研究典範的基本假設：將「研究過程」視為是「批判探究的理論與實作」，且以「批判」與「賦權」為基本路線。因此，上述實踐所生產的知識不僅是「解放的知識」，且特別重視「批判探究」的研究歷程。因此，當研究者面對理論與實作交錯張力的探究歷程時，首要面對難題有二，其一為「研究資料與理論間的關係為何？」；其二是「為展現複雜的社會過程，研究者如何避免只作出吻合抽象理論模型，或是僅將研究對象提出過度化約的解釋？」。首先，實踐取向研究者進行探究時，對研究現象雖有先驗或預設某種程度的看法（即於研究進行前已將理論預存於心），不過，於研究過程中乃將預設理論與所得研究資料不斷進行開放和辯證的對話，最後方建立研究理論。此時，實踐取向研究所建構理論是「辯證的理論」，內蘊研究者本身理念和看法的介入，企圖透過介入使被研究者產生解放的知識。在研究資料與理論間的辯證關係，乃為回應實踐取向研究典範所相信「知識是主、客觀世界聯合的產品」與「知識是辯證的」之基本主張。其次，第二個難題乃是由第一個困難衍生，因在日常生活中的確存在心理與社會、意識與潛意識的運作，藉以形塑人類經驗與知覺深層結構，這些形塑機制(與已存結構及其發生作用的歷程)相當複雜，恐怕無法用變數分析或敘述性故事加以呈現和反映。因此，如何描述這些機制形塑人們思考與行為並展現其中的複雜歷程，對研究者及其與被研究者間的關係構成考驗(夏林清，1996：102-103)。為此 Lather (1986, 263-272)茲以下三面向說明：

(一)互惠性需求(the need of reciprocity)：

「互惠性」意味著施與受(give-and-take)，指研究過程中意義與權力間

之協商，在解放取向社會科學中，互惠性關乎研究者意圖、資料蒐集程度與意義建構等面向。此時被研究者不再是被動「研究對象」轉化為「研究參與者」。就研究者意圖而言，「研究即實踐」意指研究者如何有意識透過研究，讓研究參與者瞭解並改變自身目前所處情境，為互惠性關鍵；就資料蒐集，關鍵不在於如何蒐集更多、更好資料，而是尋求彼此間最大理解，透過合作與對話等方式促成共同合作探究的可能；就意義建構而言，研究者至少應將研究現象的描述、分析和結論，都讓研究參與者確認，以達意義的協商。若行有餘力，乃進一步讓研究參與者有機會對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信念和權威，提出質疑和批判，創造辯證與自我反省的機會。

(二)辯證性理論建立(dialectical theory-building)

如前敘明，實踐取向研究所採用的理論是不斷和生活經驗辯證而來，其間隱含相存與辯證關係，允許研究者由其預設理論架構與研究資料辯證中產生命題，以開放和反省態度讓資料與理論反覆對話。此時，理論扮演活化(energizing)和觸媒(catalytic)角色，觸發研究參與者批判意識，採取行動以改變現況。因此，透過對特定現象和情境脈絡的深描實為必要，以免落入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傾向，矇蔽研究現象與資料的真實呈現。

(三)效度議題(issues of validity)

Lather 對實踐取向研究特性，重新敘明三角校正與表面效度等概念，其中，對「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修正與新創提出「觸媒效度」(catalytic validity)影響最大(Lather, 1986: 271-272)。「建構效度」強調研究須建立在理論意識脈絡上，不能脫離理論或是沒有理論為基礎，強調研究者系統性自我反省和批判，以瞭解自我認知如何影響研究進行及資料詮釋，蒐集資料並不是為作理論的符應；「觸媒效度」係指研究參與者因瞭解自身受支配處境且願意採取行動、改變現況的經驗及其程度。故實踐取向研究

致力於研究過程中引導研究對象，透過參與瞭解自身所處的真实世界，進而有所聚焦，冀以能夠自我瞭解，為改變身處受支配情境並決定採取行動，以達解放目的。

三、研究者即熱情學術批判者

Morgan (1983b)提出「研究即介入」(research as engagement)，強調研究是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的互動歷程，為整體的一部分。在探究過程中，研究者無法置身事外，透過「研究即介入」取代強調價值中立的研究取向。隨後，Lather 提出「研究即實踐」概念，指出研究者角色具有承諾與投入的意圖，為喚起被研究者批判意識，探究其自身生存現況與意義的不斷自我檢視。因此，實踐取向研究者從來不是冷眼旁觀觀察者和評價者，而是具承諾並致力改變現況、心存熱情的學術探究者，由熱情中將實踐取向研究引導成為「自我反映研究典範」(a self-reflexive research paradigm)，提出五項判準作為熱情學術探究者的自我檢視。其中，第五項為「自我持續的批判分析與啟蒙行動之歷程」(a self-sustaining process of critical analysis and enlightened action)(Lather, 1986: 268)，使得在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彼此間，能透過研究持續進行自我批判、反省與採取擺脫現狀的行動，亦即實踐取向研究典範所追求終極理想。

由方法論到研究方法：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

Lather (1986)倡議「實踐取向研究典範」作為方法論之初，並未提出配套「研究方法」。夏林清(1996: 107)撰文引介時，直接以〈實踐取向的研究方向〉為題，將「批判俗民誌」(critical ethnography)與「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列為旗下主要的兩個研究方法。「行動研究」以「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為基礎，原創概念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50年代曾盛極一時後衰退，60年代結合英國和澳洲的教育改革運動，成為當時課程

發展及教師進修的研究趨勢。發展初期以 Kurt Lewin (1890-1947) 為代表人物，不同時期行動研究有不同類型與意涵，Masters (1995) 在〈行動研究歷史〉(The history of action research) 一文，整理當時行動研究專論有三種類型：其一，「科學／技術／實證」(scientific/technical/positivist) 行動研究：美國 1940-50 年代發展初期的行動研究，為協助實務工作者改進工作品質，較不關心工作目的及品質，忽略社會文化情境脈絡與社會深層結構的影響；其二，「協同－合作實作－協商－詮釋」(mutual-collaborative/practical-deliberative-interpretivist) 行動研究：重視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界定問題、找出解決方法的行動歷程，而問題的界定往往透過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間的對話產生，以 1960-70 年代英國學者 J. Elliot 為代表，以西方社會實用個人主義為基礎，強調增進實務工作者在行動中的反思歷程；其三，「增能／批判－解放」(enhancement/critical-emancipatory) 行動研究：受法蘭克福(Frankfurt)學派影響，將 Jurgen Habermas (1929-) 「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納入，要求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有意識、採取積極和主動投入的立場，成就社會變革的政治性行動，以 1980 年代以後澳洲學者 S. Kemmis、W. Carr 和 R. McTaggart 為代表。

Reason 和 Bradbury (2001) 合撰《行動研究手冊：參與式的探究與實作》(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一書導論，指出行動研究具有「實作議題」(practical issues)、「行動中的知識」(knowledge-in-action)、「參與和民主」(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多元社群」(human flourishing) 和「具有自行揭露、持續發展之樣態」(emergent developmental form) 等五項特點 (圖 1)。

要言之，行動研究是在「參與和民主」基礎上，由「多元社群」對特定「實作議題」關注，產生「行動中的知識」，具「自行揭露、持續發展之樣態」，由此構成「朝向參與式的世界觀」(toward a participatory worldview)，並可用系統式的、全觀的、關連性的、女性主義的和經驗的 (systemic, holistic, relational, feminine, experiential) 等形容詞加以界定與描

述(Reason & Bradbury, 2001: 6-7)。有關行動研究的本體論與認識論，係以「參與式的世界觀」為基礎，誠如石中英所言：

既然人類所認識的對象並不是獨立於人類的，而是經由人類的行動參與形成的，因此它的認識就不能僅從外部來觀察，必須經由內部來理解...人類的存在又是你我他不同的行動個體與群體構成的，因此世界的存在是多元的和異質的，而不是一元的和同質的...因此關於世界的「真」也是多元的和異質的，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和終極的真理；這種多元的行動者及其所參與形成的世界也不能從僅作為「他人」研究的資料，而應該由行動者自己來認識和理解；比起他人的「客位研究」來說，行動者自己所進行的「主位研究」能夠更好地揭示或解釋實在的屬性，把握世界的多元性與異質性。(石中英，2004：72)

因此，行動研究帶有實踐色彩，透過行動創造變革的可能與契機。行動不是個人而是與社群協商完成，建構一個參與式世界觀，而知識於行動中體現，內蘊研究者、研究參與者與背後的社會體制運作，以及共同回應世界的選擇和方式。Reason (2006)在〈行動研究的抉擇與品質〉(Choice 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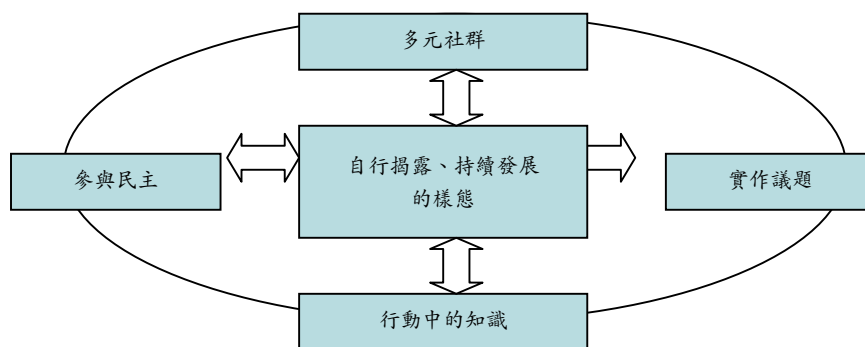


圖1 行動研究的特點
資料來源：Reason & Bradbury (2001: 2)

quality in action research practice)一文，細論行動研究的五項特點：

一、實作議題／值得實作的意圖(worthwhile practical purpose)

實作議題背後往往帶有行動者自認「值得實作的意圖」，因任何好的理論皆以實作（實踐）為基礎，並回應 Ladkin (2004)行動研究根植於日常生活現象學觀察之看法典範。行動研究試圖描繪的意象是研究者與經驗世界的遭逢，內蘊 Argyris、Putnam 和 Smith (1985)、Argyris 和 Schön (1974)指出理論與實作間的一致性，以及 Whitehead (2000)要求對由實作中發展並宣稱的知識進行檢視等面向。

二、參與和民主

Reason 引用 Kemmis (2001)作為行動研究和參與、民主的連結。Kemmis 指出「首先，行動研究是去中心的，作為溝通場域的形態，...以作為追求人與人間相互理解和共識，而(行動研究所建構的)知識，是以參與者共同結論、抉擇作為合法基礎，是行動研究核心的關注主軸」(Kemmis, 2001, 引自 Reason, 2006: 193)。

三、行動中的知識／多重層次的認識(many ways of knowing)

Heron (1996)認為，僅有當個人是有意圖的行動者與意義創造者(intentional actors and meaning makers)時，關乎「人」的研究始得以成立。Reason 借用 Heron (1971, 引自 Reason, 2006: 195-197)觀點，將「行動中的知識」劃分「多重層次的認識」(many ways of knowing)，此時「『人』如何『認識』世界」(對日常生活的現象學觀察)有以下四種類型，分別為：

1.經驗性的認識(experiential knowing)：指生活世界(lifeworld)人與人面對面時，關乎人、事或物的日常接觸並存於內心的感知經驗，即 1962 年 Polanyi 提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Reason 認為，行動研究者面對經驗性的認識時往往需與更深化經驗有所反映，始能挑戰成見。

2.表徵性的認識(presentational knowing)：指當「經驗性的認識」以故事、圖繪、雕塑和舞蹈等形式表達時，即構成「表徵性的認識」。行動研究者若僅附和原有相同故事，未能重新描述經驗，即落入行動研究危險中，惟有當「新」的故事能被敘說，背後內蘊新的表徵性認識才有可能出現

3.命題性的認識(propositional knowing)：乃是概念與想法主要的呈現形式，成為行動研究（者）與學院間溝通橋樑，當面對學院(霸權)時，行動研究不是單方面接受未經檢驗學院化命題性認識，而是在理論與實作間不斷對話，保有批判並發展替代性理論，以符合行動研究倡議「參與式的世界觀」。

4.實作性的認識(practical knowing)：「行動中的認識」(knowing-in-action)有別於「關於行動的認識」(knowing-about-action)。譬如知道腳踏車的動力運作，並不代表知道如何騎腳踏車。因此，實作性的認識核心在於：行動研究者如何產生實作性的技能，保有卓越知覺。

四、自行揭露、持續發展之樣態(emergent developmental form)

行動研究始於對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所關注與生產的知識是由生活中發展的「情境中知識」(situational knowledge)。因此，「好」的行動研究是於一連串發展中與時俱進的自行揭露(emerges over time)；對行動者而言，探究技藝將對情境中知識的發展有所精進；對行動社群而言，對實作議題的理解隨著時間不斷深化與轉化。自我揭露的行動研究所探究問題或許改變，行動者與社群的關係抑或不同，行動目的與核心關鍵也會轉化，因此，反映行動研究並無固定模式可遵循，無法以任何定義加以界定，此為行動研究最鮮明的實踐性格。

是故，若就上節「實踐取向研究典範」主張，並參考 Kemmin 與 McTaggart (2000)依行動的實踐主體（個人或社會）及其意圖，將行動研究可能採用的研究方法，劃分為以下五大類（表 1），上述 Masters (1995)行動研究的三種類型：1.「科學／技術／實證」行動研究；2.「協同－合作／

實作－協商－詮釋」行動研究；3.「增能／批判－解放」行動研究，僅有「增能／批判－解放」類型的行動研究，真正合乎「實踐取向研究典範」背後的知識觀。

表 1

焦點 角度	個體	社會	二者兼具 反映的－辯證的
客觀的	1.實踐是個體的外顯行為：量的、相關-實驗研究法；心理測量、觀察、檢定、互動量表。	2.實踐是社會的以及系統的行動：量的、相關-實驗研究法；觀察、社會測量、系統分析、社會生態學。	
主觀的	3.實踐是有意圖的行動：質的、詮釋研究法；臨床分析、訪談、日誌、自我報導、自我省察。	4.實踐在社會生活的互動過程中被論述和傳統給結構和型塑：質的、詮釋的、歷史的研究法；論述分析、文件分析。	
二者兼具 反映的－ 辯證的			5.實踐是被社會和歷史所構成，以及被個體和社會行動所重構：批判的方法；辯證的分析(多元方法)。

(資料來源：Kemmis & McTaggart (2000), Table 22.1/ 製表：本研究)

反映中的反身性實作：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

Teather (1991)在〈博物館研究：反映中的反身性實作〉(Museum studies: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一文，借用 Schön (1983)《反映的實踐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書概念，檢視博物館學(museology)的本體論與知識論，認為：當代博物館學應有意識地重新反思「何謂藏品？是理念，還是物件？」、「複數博物館：博物館是什麼？」(Museums: What is a museum?)以及「她是誰的博物館？複數博物館為誰存有」(Whose museum is it / Museums for whom?)，以解構博物館傳統思維，進而建構「博物館學民主的進程」(the process of museological democratization)。該民主進程包括以下五項芻議(paradox)(Teather, 1991: 413-414)：

- I 所有文化均為平等(all cultures are equal)；
- II 個人與集體(personal and collective)；
- III 打破博物館內館外(breakdown between inside / outside)；
- V 多重發聲的平等：專家 vs. 常民(equality of voices-expert vs. everyday)；
- IV 已開發國定與第三世界間的均衡(balance of developed and third-world)。

Teather (1991)的主張，相當程度改變了當代博物館與社會的關係，宣示了一個理想，一個博物館研究的理想倡議。一如前述，行動研究屬於「批判/實踐取向研究典範」，始於研究者對日常生活經驗裡現象學式觀察(Ladkin, 2004)，終極關懷在於追求可增加研究對象知覺，以瞭解並看清日常生活中隱藏的矛盾，產生對扭曲現象的能力與行動，最終創造社會體系變革的可能(Lather, 1986; 夏林清, 1996)。生活經驗背後隱含更大的社會體系，社會體系的運作有賴人們參與，兩者關係如 A. G. Johnson 指出：

社會體系並不是某某東西。社會體系是一種持續進行的過程。人們有所行動，想要讓體系運行，體系也不斷地改頭換面，推陳出新。……還有更複雜更有趣的是，很重要地，我們的處境都不一

樣。因為我們在每個體系佔據的是不同的社會位置，我們的經驗也會大不相同。社會體系給予我們不同的形塑力量，不同的限制，我們參與的方式也會不一樣。（成令方等譯，2001：39、41）

因此，行動研究試圖提供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參與社會體系運作的路徑，進而創造社會體系變革的可能。Reason 和 Bradbury 對行動研究的定義為：

一種參與式的民主歷程，關乎人群在特定意圖下所發展的實作認識，……致力於在行動與反映、理論與實作、與他者的參與之間的連繫，不僅為受壓迫者所關注的議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並使其個人與社群成長茁壯。（Reason & Bradbury, 2001: 1）

於此定義下，其首要強調在理論（研究者對特定脈絡及其現象的瞭解與分析）與實作（研究者所採取的策略和行動）間所存在來回修正的辯證張力(the dialectical tension)(Lather, 1986; 夏林清, 1996)。為透視行動中所產生的張力（包括：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其參與社會體系運作的角色和方式等不同面向），Schön (1983)提出「行動中反映」(reflection-in-action)作為新的實踐認識論，定義為「在行動過程中實踐者所表現出的思考」，為體現行動研究「反映理性」(reflective rationality)的本質，具有：「行動中的認識」(knowing in action)、「行動中反映」(reflection-in-action)和「對行動反映」(reflection-on-action)等三種形式(茲整理，詳如表 2)，促使研究者於行動中能夠真正反思，進而在理論與實作間更細緻描述「行動中的知識」(knowledge- in-action)，基本主張如下：

當某人在行動中進行反映時，他就成為實踐脈絡中探究者。他並不憑藉既存理論和技藝中所建構的範疇行事，而是針對此獨特個案建構一套新的理論。他的探索並不是侷限於為達成目標先前所設定協議的方法，也不是將目標與方法視為分離，反之，而是將兩者框架於特定的問題情境中相互定義。他不會將思考(thinking)

與實作(doing)有所切割，他的推論最終是為了轉化為行動的決定。因此，他的實驗是一種行動，成就了他的探究。因此，行動中反映並不受科技理性的二分法所束縛，即便在不確定或特有的情境中，仍得以繼續向前推進。(Schön, 1983: 68-69)

Schön (1987)指出「行動中反映」重要性在於面對特定行動情境，行動多半以本能或慣性加以回應，實屬「行動中的內隱認識(tacit knowing in action)」，無需有意識深思熟慮即可行動，而行動結果多半在預期內，一旦當行動結果超出預期，促使行動者對當下行動重新進行反映，反映方式之一為重新建構行動

表 2

類別	說明
行動中的認識	行動者通常對自身實踐知識及其來源缺乏意識，無法清楚言說，意即雖其無法將自身思考和行動分開，但可透過觀察理解其「內隱知識」，是對日常例行生活的行動探究。
行動中反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當個人在行動中反思，便成為實踐脈絡中的研究者。此時，研究者不依靠現存理論或技巧來處理問題，而是針對特定情境來思考問題，並將目標和手段視為是一種相互建構的關係，依彼此需要調整。 2.研究者的思考不脫離實踐，所有決定須轉化為行動，在行動中推進對事物及其情境的探究。
對行動反映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當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明白以口語建構或形成知識，即將自己抽離出行動，對自身行動進行反思。此反映雖恐減緩其行動速度，並對例行行動流暢性構成干擾，同時催化了對行動的細微分析，有利於規劃變革。 2.內隱知識明朗化（特別是口語化）將增加知識的可溝通性，是專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將自身實踐性知識語言化，不僅為幫助應付更複雜的社會問題，有助於溝通，進而使內隱知識得以傳承。

（資料來源：Altrichter, Posch & Somekh, 1993；夏林清等譯，1997：263-267/
製表：本研究）

；其二是重新框定(reframing)對現象的理解與提問方式，進而誘發影響行動的再思考，設計新的行動策略，最終為複雜的實務問題提出特定解決之道。況且，「在行動中反映是一回事，要對我們的行動中反映進行反映，以便對行動中反映進行精確的語言描述，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進而對描述的結果進行反映則又是另一件事」(Schön, 1987: 31)。因此，之於行動研究，對行動歷程的書寫(特別對「行動中反映」精確描述)有其必要，間接影響並形塑下一個行動。

根據 Argyris 和 Schön 共同發展的「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action)，基本假設為人們「在 S 情境中，若要達到 C 結果，便在 a1...an 的假設下做 A 行動」(Argyris & Schön, 1974: 6)，而行動理論有「奉行理論」與「使用理論」兩類，前者指行動者所宣稱的遵行理論；後者由實際行動中推論出來的理論，認為人們是自己行動的設計者、人們會對自身的行動結果建構意義，透過意義理解外在環境，對環境的建構又形成日後賦予環境的理解與意義建構，導引下一個行動。當行動發生時，人們一邊檢視自己行為的有效性，同時檢視對環境的建構是否恰當，進一步創造社會變革的可能。故當「行動發生」時，便是進行「行動中反映」或「對行動反映」最佳時機，且所反映的行動乃具有以下層次：首先，具有複雜的實作問題需要特定解決之道；其次，解決之道只能在特定脈絡中發展，因問題是在脈絡中發生與形成，行動者(研究者／實務工作者)更是扮演關鍵的決定性角色；第三，這些解決之道並不能任意挪用至其他脈絡，但可被其他行動者視為工作假設，並在他們自己實務環境中檢驗。

夏林清長期致力於推動行動研究以創造社會變革(如基層教師專業變革、社區大學與公娼運動)之可能，透過「說故事」回觀自身近廿年專業生命實踐及其邊界，進而參透自己「其實參與在一個以實踐行動生產知識的社會歷程中」(夏林清, 2004: 138)，對「說故事」作為「行動中反映」與「對行動反映」的方法，多有闡釋，她說：

一個人「說自己」的行動本身也可以成為反觀自己的素材，因為敘說文本與言說行動本身即承載了說者的視框(frames of seeing)、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與自己和自己、他者與世界之關係方式(ways of relating)的訊息，當言說行動未展演表達之前，這些訊息未必是全然地被言說者所覺識的。(夏林清，2004：142)

之於 Donald A. Schön (1930-1997)，「說故事」背後帶有「對話」的隱喻與作為協助「反映思考」工具的意圖，因「行動研究者不輕易混淆自己與理論、對象、及其自身的關係層次；並且企圖通過『對話』關係，在實踐場域中發展出肌理可尋的認識歷程；唯有如此，行動研究的脈絡才能建立在以實踐者為行動主體的探究邏輯上」(夏林清，2000：239)。

由理論到實踐：召喚臺灣在地「批判博物館學」(暫結語)

Teather 與 Carter (2009)合撰〈當今的批判博物館學：理論／實作／理論〉(Critical Museology Now: Theory/ Practice/ Theory)一文，提出「批判反映的博物館專業」(Critical Reflexive Museum Professional, CRMP)模式，作為 Teather (1991)倡議「博物館研究」成為「反映中的反身性實作」之具體回應。雖兩篇專論相距近十八餘年，但並不表示 Teather 將「博物館研究」視為是「反映中的反身性實作」之原創概念未受重視。事實上，Teather (1991)論述基礎在於「博物館學方法論與研究方法」反覆思辨和辯證，此概念在她早期另篇〈博物館學研究問題的簡要註記〉(Some brief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museological research)(Teather, 1983)專文隱然略見，直接影響「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的理論建構與在地實踐。Mensch (1992)系統性梳理西方博物館學發展，認為博物館學研究主要有「實證-理論取向」(the empirical-theoretical approach)、「實踐取向」(the praxeological approach)和「哲學批判取向」(the philosophical-critical approach)等三種路徑，並指出 Teather (1983)一文的重要性在於不僅作為哲學批判研究取向的基礎，同時反映西方博物館學的發展進程，亦開啟當代「批判博物館學」(critical

museology)的先聲。

以下除梳理當代博物館面對社群如何建構（內蘊認同和差異）多重的社會關係外，有關批判博物館教育與展示設計、臺灣原住民文物與其原生社群的相遇、臺灣以社群為主體的小型策展等案例討論，並無法(也無意)完整交待中西實踐取向博物館學研究的實作成果，旨在「召喚臺灣在地『批判博物館學』的行動書寫」。Watson (2007: 2)主編《博物館及其社群》(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一書，她以「博物館如何盡其所能與所有社群建構一個透明、具包容性與公平的關係」自我提問，作為導論倡議，此倡議與 Teather (1991)主張「所有文化均為平等」互為表裡，但關鍵在於「如何實踐，才不流於空談」。事實上，當代博物館與社群(communities)的關係與連繫，提供了博物館介入社會並與之共振的行動內涵，並以「差異社群再現」推動了博物館策展的轉向。Mason (2005: 206)整理歐美博物館學對社群的定義，有以下六種範疇：其一，以「共享歷史或文化經驗」定義社群；其二，以「特定專業知識」定義社群；其三，以「地理及社經條件」定義社群；其四，以「認同」(identity)定義社群，包括國族、區域、地區與性別、性傾向、肢障與年齡等相關認同；其五，以「參訪經驗」定義社群；其六，以「由被其他社群所排除」定義社群，涉及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

按 Mason (2005)整理，此定義呈現博物館與社群相互建構、內蘊認同和差異的多重社會關係。Baker (2004: 53)認為「差異不是物件的本質或屬性，而是一種象徵的關係和位置或面向。...認同並非固著於由我們所擁有某個物件上，而是對我們自身一種情緒性的象徵描述。相對於差異的概念，認同不是固定不變，而是一個『成為』(becoming)的歷程」；Giroux (1992)指出：保守主義者視差異為「異常」，試圖加以排除；自由主義雖看見差異，卻以文化霸權加以「隱匿」；惟有基進主義者由「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裡發展對差異的「讚頌」，主張「差異」乃「被建構於種族、階級、性別等不同身分認同之上」。綜合以上，無論是以異常、隱匿或讚頌面哪種態度對

差異，皆將持續影響並成為認同的一部分。面對差異，「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為對應的概念，有關博物館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研究，以 Sandell (1998, 2002)和 Sandell、Dodd 與 Jones (2010)具為代表，其中 Sandell (1998)認為必須將「文化面向」納入博物館與社會、政治及經濟的相互作用關係中，才能將「再現社會排除」(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exclusion)的博物館，具體轉化為「社會融入的能動者」(museum as agent of social inclusion)，此論述正是 Clifford (1997)反思殖民主義下博物館與被殖民者關係的揭露與深化。

Clifford (1997)對自身人類學者與博物館人的視框多有反思，且特別關注博物館與殖民者、被殖民者間的「關係」。他指出：(人類學)博物館體現了殖民者的特殊想像，通過其眼光再現了被殖民者之歷史和文化，多有侷限。此觀點下的博物館不只是研究或協商的場所(more than a place of consultation or research)，也不是邊界(frontier)，而是如 Mary Louis Pratt 定義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並認為：

當博物館被視為是「接觸地帶」時，其以典藏品(collection)作為的組織結構，將被轉變成為一個持續進行的歷史、政治與道德之關係(relationship)，也是一種進退並存的權力交換體(a power-charged set of exchanges, of push and pull)。(Clifford, 1997: 192)

Lindauer (2007)在〈批判博物館教育與展示發展：第一步〉(Critical museum pedagogy and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 first step)一文，試圖將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應用於博物館策展和展示設計，她以在一幅以印地安文物為背景 Fred Harvey 和合夥人合拍的照片，加上「當原住民受迫被趕到更偏僻荒涼之地時，歐裔美國人就開始聚積成千上萬的印地安文物」(頁 309)說明文字為例，認為：此段文字僅輕描淡寫，是個高明的批判論述，雖未直接挑戰即有社會階級、歷史觀點，不會讓觀眾有不好感受。這與 Aronowitz 和 Giroux 認為：只有轉型(transformative)論述才具有潛力，得以

在多重的意義間鬥爭以產生連結、挑戰權力，使得「教育更政治化、政治更教育化」(the pedagogical more political and the political more pedagogical)。此時，博物館(透過藏品策展)化為「進退並存的權力交換體」，建構一個開放、安全與包容的展覽場域，讓觀眾(無分白人、原住民)重新體驗「一個持續進行的歷史、政治與道德之關係」，有機會將眼光由過去朝向共同的未來。

2007年，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在「大館牽小館·跨步向前走」計畫主導下，2008年由館方研究員選件辦理巡迴特展，深入地方文化館，其中一站為花蓮瑞穗的奇美原住民文物館，當時引發館長吳明季合作策展的想法；2009年奇美部落以迎接祖靈的心情合辦「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吳明季(2011)在〈物的力量—從「奇美文物回奇美」到「恢復失傳祭典儀式」〉一文，表示：「合作策展」的意義關鍵在於策展的詮釋權完全交由部落主導，且佈展文物乃是由部落耆老到臺博館庫房親自挑選。作為該特展的大館策展人，李子寧(2011)則以〈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一文作為回應，論及耆老到庫房挑選展品時的內心觸動，他說：

.....在2009年3月2日臺博館徐州路六樓織品庫房所發生的，和1989年James Clifford在波特蘭美術館地下室所目睹的，仍有著某種本質上的雷同。後者透過潰堤而出的歌聲與故事吟誦顛覆了預設的議程，前者則在預定的議程中悄然逆轉了主客對文物的詮釋優勢。但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創造了一個「接觸地帶」，讓歷史上擁有不同歷史軌跡、文化背景與政經地位的人群在一個短暫空間裡交叉對話，針鋒相對，碰撞出任何意想不到的火花。(李子寧，2011：8)

事實上，博物館作為一個「機構」(institution)，其蒐藏與策展從來不是中立，處處流竄政治與權力的張力與運作，但就本文所倡議的「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吳明季(2011)與李子寧(2011)兩篇專論分別站在不

同的行動位置，用各自特有眼光「說故事」，訴說一個策展實踐歷程的故事，特別在於：因它有兩個版本，交織而成，始得以管窺（策展作為）「行動研究的脈絡才能建立在以實踐者為行動主體（博物館國臺博 vs. 社群奇美部落）的探究邏輯上」（借用夏林清(2000：239)用語），且於相對程度上進行了「對行動進行反映」的對話。之於臺博館，館方願意開放並嘗試以合作策展的形式「盡其所能與所有社群（奇美部落）建構一個透明、具包容性與公平的關係」，奇美部落（和吳明季）以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脈絡參與其中，共同開啟了臺灣在地「實踐取向的博物館合作策展」先聲。

筆者曾依 Lather 與 Teather 論述，以行動研究為方法，記錄自身與同志（鄭邦彥，2012a）與社區大學、移工（鄭邦彥，2012b）等非主流社群之策展行動，其中，在〈「誰」是博物館社會體系下的「非觀眾」？—初論「凝視驛鄉—Voyage 15840 移工攝影巡迴展」於蘆荻社大之行動研究〉（以下簡稱〈誰〉文）（鄭邦彥，2012b）一文，除得兩篇匿名審查意見外，並有三篇具名回應文，分別來自博物館學（郭瑞坤，2012）、社區大學（朱瑩琪，2012）與國際勞工運動（龔尤倩，2012）等不同的學術領域或實踐位置。其中，郭瑞坤（2012）以「誰來跨博物館行動，研究？」(Performing action research crossing the museum?) 提問式的破題，指出「這一篇文章既是作者跨界的行動研究紀錄，也是其從事博物館實作的實驗民族誌」，初讀郭君回應時，筆者多有困惑，主因於自身未曾以「實驗民族誌」(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看待自身及這一連串策展行動，當郭君提及：

總的來說，〈誰〉文呈現出近年來當代博物館學的一種想望、一種處理社會議題必要的焦慮與張力。讀完作者的行動研究，不免衍生出其他疑問。作者與協同研究的社大行動者、《凝視驛鄉》策展者 TIWA 之間，行動的社會關係為何？策展過程與結束後，發生了什麼改變？實踐取向的研究多半重視作者「告白」實踐，之於社會變革議題，作者的告白會是什麼，以及什麼樣的變革想像？我想，這些會是期待於博物館內之文化行動的人們所感興趣的。

此提問促使筆者反躬自問(「對行動進行反映」),若〈誰〉文自名為「行動研究」,那麼是否應多些「故事/告白」(至少包括自己對博物館的期待及其之於社會所能扮演角色,還有自身對博物館如何透過策展與社會共振的想像等),這些故事/告白不僅對個人行動有所反映,也向讀者交待其背後到底悉盼博物館創造出「怎樣」的社會變革。事實上,「筆者期待『怎樣』的社會變革」早在郭君回應文結語,隱然略見:

倘若博物館在 21 世紀台灣還能促生公共文化、尚具有公共與社會正義的價值,我們需要在物質空間的安排、制度上社會團體的參與、以及包容性的共同想像上,與博物館之間生成更多介面的實作。據此,亦更能理解博物館與物質、社會性、文化想像間的多重關係為何,進而測繪台灣的博物館公共文化的演變。(郭瑞坤, 2012: 232)

一如前敘,社會體系的運作有賴人們參與;博物館作為社會體制之一,有賴館員投入和觀眾參與。於此多重關係中,無論是館長、研究員、登錄員、教育人員、導覽員及保全人員等館員,「藏品保管和策展」提供了館方內部運作的主要方式。然而,面對體系與其中參與者的關係,A. G. Johnson 以「阻力最小的路(徑)(a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作為隱喻,他指出:

人們參與社會體系,會發生什麼事,取決於兩件事:一是系統本身,以及它運作的方式,另一是人們不時身處其中,通常會有的作為。……體系會影響我們作為參與者的想法、感受與行為,靠著就鋪陳出這些阻力最小的路。任何時刻,都有無限多種的事我們可以做,可是我們通常不會這麼想,而只是看到很有限的幾個可行性。這些可能性的多寡,端看我們參與的體系為何。(成令方等譯, 2001: 22、24)

若同意「行動研究」終極關懷在於「創造社會體系變革的可能」,那麼行動者(研究者、協同行動者與研究對象)實無法安於選擇「阻力最小的

路」，反而更汲於「另闢蹊徑」。回到以博物館作為實踐場域，或更需要反思「博物館體制如何創造了『阻力最小的路』，或使內部館員順利參與其中運作，但是否也同時『限制』了外部觀眾參與的方式？」

回到 Lather (1986)與 Teather (1991)論述，更值得關注的是：在「打破博物館內／館外」的合作策展歷程中曾發生哪些張力？如何辨識張力的存在及其本質？又是如何打破此張力，最終達到並滿足館方與社群「互惠性」的原則，以呈現多重發聲的平等？撰寫本文，不單單只是為了勾勒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的理論芻議，更是敬邀以「實踐尚待反映，博物館館員仍需努力」為名的行動書寫，因唯有透過有意識的行動書寫，始能確知「在博物館與社群之間，博物館做了什麼（打破了什麼、如何打破），又發生了什麼」。最後謹借用李子寧的話「如果說 2009 年 3 月 2 日在臺博館庫房裡發生了什麼事，或沒有發生什麼事，它都註定只是一個開始」(2011：8)，冀以本文（理論芻議）作為另個開始，再次敬邀博物館同好齊來書寫您自己的「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在地實作」。

是故，Lather 核心論述是由「知識從來不是價值中立，而是在特定歷史和情境脈絡下，根據時人與所處情境下所建構而成」的知識論上開展；Teather 以 Schön 反身性實作為研究方法，召喚我們不再只是「博物館館員」，變身為「反映中的實踐者/實務工作者」，帶著「『博物館』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視框，從敏銳體察「當理論遇到實作（面對館內外與社群的多重張力）」中，轉化提煉「行動中的知識」/「多重層次的認識」，拭目以待。

〔後記〕之於博物館學門，「行動研究」在臺灣教育研究場域相對是門顯學，也可由臺灣博碩士論文有 83 篇博士論文、2,961 篇碩士論文以「行動研究」為關鍵詞（查詢日期 2015 年 2 月 3 日）可見一斑，但無法迴避的是「什麼才是真正的行動研究」，此為近十年臺灣教育研究關注的議題之一。2003 年 4 月 19、20 日，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策劃「教育研究方法論研討會」，會議子題五「行動研究與臺灣的教育研究場域」，隔年會

議論文以《教育研究方法論：觀點與方法》(潘慧玲主編, 2004) 為名集結出版, 其中, 蕭昭君 (2004) 提出「有研究的行動, 卻不必然有行動研究」觀點, 細膩交待身為一位師資培育者面對行動研究時的困惑與反思。同理, 「什麼才是真正的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也是筆者嘗試解惑的題目, 當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約而同認為(本文)「著重於社會科學的知識論與方法論的論述, 鮮少對博物館(或博物館學)的實踐提出探討」, 直指本文不足之處。其中一位審查委員進一步表示:

博物館研究建立在跨領域研究的範疇和基礎上, 新的理論意向往往 借助其他學術累積的基礎, 來拓展其問題意識的合理性。這是常態學術積累的拓殖進程。.....為實踐取向的博物館研究勾畫一幅理論圖繪(mapping)。在該文前兩層次理論釐清的前提下, 實踐具有行動/改變的渴望。於此, 行動研究為實踐取向之博物館研究的重要肌理, 是促發社會體系變革的必要(學術)條件。此一理論意圖對於博物館研究的實踐潛能, 有相當深刻的社會意義。探索博物館研究/實踐的能動性, 本為博物館學術與社會踐之接合的重要部份。.....當然該文不是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而是一種新的學術與行動之召喚。作為研究論文, 該文可以更深入辯明「實踐」在博物館的版本與歷史進程, 提出更整全、更大膽的博物館實踐論述。

該評語提綱挈領, 深化拙文品質, 更揭露對臺灣博物館的期許和熱情, 希望不久的將來能以「實踐取向博物館研究: 在地實作」為題撰文, 更完整呈現臺灣博物館的實踐論述, 並補充本文不足之處。謹此由衷感謝審查委員的斧正, 併以此文紀念博士班階段的學習歷程, 無論是指導教授的悉心引導與口試委員的犀利提問, 敬表謝忱(雖未具名, 相信諸師長也能感受)。惟文責當仍由筆者自負。

參考文獻

- 石中英，2004。行動研究本體論假設的再思考，教師教育研究 16（4）：71-75。
-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Johnson, A. G. 著，2001。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臺北：群學。
- 朱瑩琪，2012。回應文：「誰」是博物館社會體系下的「非觀眾」？，應用心理研究，56：232-237。
- 吳明季，2011。物的力量—從「奇美文物回奇美」到「恢復失傳祭典儀式」，臺灣博物館季刊，30（2）：14-19。
- 李子寧，2011。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館季刊，30（2）：4-13。
- 夏林清，1993。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臺灣勞工生活的調查報告。臺北：張老師。
- 夏林清，1996。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即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99-120。臺北：巨流。
- 夏林清，2000。教育實踐中的多重對話關係：回應潘世尊老師的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8：239-244。
- 夏林清，2004。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23：131-156。
- 夏林清、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譯，Altrichter, H., Posch, P. & Somekh, B.著，1997。行動研究方法導論—教師動手做研究。臺北：遠流。
- 徐偉民，2004。一位國小教師教學實踐的歷程：以批判民族誌為方法的教學革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高雄市。
- 郭瑞坤，2012。誰來跨博物館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應用心理研究，56：230-232。
- 潘慧玲（主編），2004。教育研究方法論：觀點與方法。臺北：心理出版社。
- 鄭邦彥，2012a。穿越污名的同志策展——一位基層博物館員的書寫與反思，博物館學季刊，26（3）：37-59。
- 鄭邦彥，2012b。「誰」是博物館社會體系下的「非觀眾」？初論《凝視驛鄉—Voyage 15840 移工攝影展》於蘆荻社大之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56：191-229。

- 蕭昭君, 2004。國內教育行動研究解放了什麼?——一個師資培育者的閱讀與困惑。潘慧玲(主編), 教育研究方法論: 觀點與方法, 頁: 457-494。臺北: 巨流。
- 龔尤倩, 2012。誰的主體?! 「誰」是博物館社會體系下的「非觀眾」回應, 應用心理研究, 56: 237-238。
- Argyris, C. & Schön, D., 1974. *Theory in Practice: Increasing Professional Effectivenes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Argyris, C., Putnam, R. W., & Smith, M. C., 1985. *Action Science: Concepts, Methods, and Skills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Barker, C., 2004.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Ltd.
- Clifford, J., 1997.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Clifford, J.,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88-21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roux, H. A., 1992. *Border Crossings: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Heron, J., 1971. *Experience and Method: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Experiential Research* Guildford: University of Surrey. Retrieved June 6, 2012, from <http://www.human-inquiry.com/Experience%20And%20Method.pdf>
- Heron, J., 1996. *Co-Operative Inquiry: Research into the Human Condition*. London: Sage.
- Kemmis, S., & McTaggart, R., 2000.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Denzin, N. & Lincoln, Y.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67-6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emmis, S., 2001. Exploring the relevance of critical theory for action research: 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the footsteps of Jürgen Habermas. *In: Reason, P. & Bradbury, H. (Eds.), 2001.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pp. 91-102. London: Sage.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dkin, D., 2004. The phenomenological roots of ac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3(1): 109-127.

- Lather, P., 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3): 257-277.
- Lindauer, M. A., 2007. Critical museum pedagogy and exhibition development: A first step. *In*: Knell, S. (Eds.), 2007. *Museum Revolutions: Museums and Change*, pp. 303-314. London: Routledge.
- Mason, R., 2005. Museums, galleries and heritage: Sites of meaning-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In*: Gerard, C. (Ed.), 2005. *Heritage, Museums and Galler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p. 200-214. London: Routledge.
- Masters, J., 1995. The history of action research. *In*: Hughes, I. (Ed), 1995. *Action Research Electronic Reader*, New South Wales: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Retrieved June 6, 2012, from http://www.iopp.ru/pub/21sept06_M2.doc.
- Mensch, P. V., 1992. *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Zagreb.
- Morgan, C., 1983a. Toward a more reflective social science. *In*: Morgan, C. (Ed.), 1983.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368-376. CA: Sage.
- Morgan, C., 1983b. Research as engagement: A personal view. *In*: Morgan, C. (Ed.), *Beyond Method: Strategies for Social Research*, pp. 11-18. CA: Sage.
- Reason, P. & Bradbury, H., 2001. Inquiry and participation in search of a world worthy of human aspiration. *In*: Reason, P. & Bradbury, H. (Eds.), 2001.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pp. 1-14. London: Sage.
- Reason, P., 2006. Choice and quality in action research practi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5(2): 187-203.
- Sandell, R., 1998. Museum as ag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7(4): 401-418.
- Sandell, R., 2002. Museums and the combating of social inequality: Roles, responsibilities, resistance. *In*: Sandell, R. (Ed.),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pp. 3-23. London: Routledge.
- Sandell, R., Dodd, J., & Jones, C., 2010. *An evaluation of sh[out] – The social justice programme of the Gallery of Modern Art, Glasgow 2009-2010*, UK: Culture and Sport Glasgow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 (RCMG). Retrieved October 1, 2014, from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YQFjAB&url=https%3A%2F%2Fwww2.le.ac.uk%2Fdepartments%2Fmuseumstudies%](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CCYQFjAB&url=https%3A%2F%2Fwww2.le.ac.uk%2Fdepartments%2Fmuseumstudies%2F)

2Frcmg%2Fprojects%2Fsh-out%2FAn%2520evaluation%2520of%2520shOUT.
pdf&ei=kMYrVPq6FZa78gX5rYLAAQ&usg=AFQjCNFBMNs1POEVW3pe5I
Lkv13TmbT_xQ&bvm=bv.76477589,d.dGc

- Schö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 Schön, D., 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Teather, J. L. & Carter, J., 2009. Critical museology now: Theory/ practice/ theory. *Muse* (Nov. / Dec.): 22-33.
- Teather, J. L., 1991. Museum studies: Reflecting on reflective practic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0(4): 403-417.
- Teather, J. L., 1983. Some brief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museological research. *In*: Sofka, V. (Ed.), 1983.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COFOM Study Series 5 (Stockholm): 19-29.
- Watson, S. (Ed.), 2007. *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Abingdon: Routledge.
- Whitehead, J., 2000. How do I improve my practice? Creating and legitimating an epistemology of practice. *Reflective Practice*, 1(1): 91-104.

